

形神兼备，都市圈组团发展

破解停车难 政府把门打得更开

本报记者 巩持平 实习生 陈忆雨

这段时间，都市圈的存在感越来越强了，多次出现在面向未来的重要政策文件中。

都市圈“组团”发展为何在此时被置于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历经多年发展，各个都市圈自己都开展了很好的探索，但都市圈内部的空间组织效能可以进一步提升。都市圈之间的连接和互动还可以更加紧密和频繁，长三角都市圈的结构性能还有比较大的释放空间。”上海市发展改革委研究院院长张忠伟说。

进一步做强“腰部力量”

记者：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已走过7周年，为何在此时提出加快长三角现代化都市圈建设？

张忠伟：都市圈决定着城市群发展的规模和能级，长三角要巩固提升动力源作用，就要进一步做强都市圈这个“腰部力量”。目前长三角有9个“万亿城市”，这9个城市经济总量占长三角的57.9%，贡献了长三角65.5%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这9个城市都是长三角“1+5”都市圈中的单体城市，如果按都市圈范围计算，长三角都市圈的分量和地位将会更重。

2018年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沪苏浙皖在“面”上跨领域的合作探索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在“点”上，像一体化示范区这样的跨省域板块，或者像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这样的跨区域平台，进行了更深度的利益融合试验。回头复盘看，“面”上探索和“点”上试验之间，“都市圈”这个中间层的推动是不够充分的。未来5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要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必须把“点”

上的经验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制度性扩散，必须将“面”上的合作放在更精准的单元推动走深走实，这必然就会聚合到一个中间层次，都市圈也因此成为理想空间。

记者：当前推动都市圈同城化发展的核心思路是什么？

张忠伟：“都市圈同城化”中有两个不同的关键词。“都市圈”是一个空间范围概念，有相对的地理边界，是由核心城市（通常是万亿级经济中心城市）向外辐射，由点及面形成的圈层，呈现出网络状的结构。“同城化”则是一个功能概念，意味着都市圈内各主体的联系像同一座城市那样紧密，标准趋于统一，实现“不是一个城市，胜似一座城市”。把两者结合起来，实现更深层次的功能连接，意义非常重大。

当前推动都市圈同城化发展的核心思路是追求“形神兼备”，其内涵可以从多个层面理解。

首先，在都市圈整体层面，“形”是都市圈的空间形态，“神”是同城化的功能内涵，两者要结合。

其次，在每个具体领域，“形神”也要紧密结合。比如，基础设施建设是“形”，但如果没有一体的跨区域运营管理机制，那就缺了“神”，所以两省一市共同组建了环沪轨道交通运营公司，来统一运营沪苏嘉城际铁路；在河湖治理领域，河道整治贯通是“形”，但如果没有协同的运营维护机制，也就缺了“神”。

再次，在规划层面，国土空间规划是“形”，它更关注用地布局、空间管控；但如果没相应的发展规划来明确目标愿景、实施重点，没有相应的协调机制和制度保障去推动落实，规划就会悬空。所以，空间规划的“形”需要发展规划和制度保障的“神”来匹配。

从“蓝图”落实为“实景”

记者：要实现都市圈同城化“形神兼备”的目标，当前面临的瓶颈是什么？下一步应该从哪些方面突破？

张忠伟：长三角都市圈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有规模体量，但辐射带动有待加强。中心城市能级有待提升，上海GDP约7500亿美元规模，约管位居全球城市第5位，但与纽约、东京还有不小差距，上海都市圈与纽约都市圈、东京都市圈也有不小差距。二是有空间形态，但功能网络有待加强。很典型的就是轨道交通网络，目前轨道交通体系仍难匹配高频次、高密度的跨城通勤需求，需要加强城市边界间的“互联互通”。三是有机制框架，但协同合力有待加强。虽然长三角在都市圈层面都探索建立了相应的协调机制，但横向协调多，真正碰到“硬仗”的领域，只能“抱腕而叹”。

此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瓶颈就是“赋能不够”。以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为例，示范区建设之所以成绩斐然，与具备赋能工具密不可分：一是“资金池”，沪苏浙三省一市共同出资成立了专项资金，三年不少于100亿元，滚动式推进。二是“审批权”，示范区可以通过委托审批和联合审批两条路径，实现跨域项目的审批。反观长三角都市圈，省级层面目前还没有共同设



立专项资金，赋予跨域项目审批权等这样的实践，需要真金白银投入和权限突破的跨域优先议题很难得到有效推进。

面向“十五五”，要让都市圈同城化从“蓝图”落实为“实景”，长三角都市圈建设可以重点在三个方向发力：一是推动空间规划与发展规划的融合，以中长期、战略性规划的编制凝聚发展共识，形成共同愿景，并推动发展策略获得高质量空间支撑，让规划更具落地可能性。二是强化省级层面对都市圈的赋能，省级层面应研究并建立对都市圈发展的支持机制，在资金、审批、指标等方面进行实质性赋能，让优先议题有实现的可能。三是建立有韧性的工作推进机制，都市圈不只是“朋友圈”，而是要成为“共同体”，要建立能持续协商、能形成约束、能解决分歧的韧性机制，并在专项领域探索协同立法，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本报记者 于量

如何挖掘和释放既有停车资源，是破解“停车难”的关键。日前，杭州市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杭州市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泊位对外共享开放工作的通知》，宣布自3月31日起，杭州市级及以下机关事业单位的内部停车场库将全部对外开放。

杭州此次发布的政策明确，除涉密、学校、医院等特殊单位，杭州市级及以下机关事业单位的内部停车场库均被纳入开放范围。开放时间原则上为工作日下班后1小时至次日上班前1小时，双休日、法定节假日全天开放。开放数量则不少于本单位总泊位数量的30%，中心城区和商业区鼓励进一步提高比例。

值得一提的是，针对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持续攀升的现状，通知特别要求配备充电设施的单位同步开放不低于30%的充电桩。

事实上，机关大院打开大门，面向社会开放闲置停车资源，长三角多地此前早已有所探索。其中，最早、最普遍的尝试，便是利用节假日等非工作时间，临时开放政府单位停车场。

早在2013年，浙江嘉兴海盐县就启动了机关事业单位停车位错时免费开放工作。当年6月1日，该县26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就“腾”出500个车位，在工作日夜间、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全天免费对外开放。

随后，类似的探索在长三角各地如雨春笋般涌现，且大多集中在节假日这一停车需求最旺盛的阶段。2018年10月，浙江海宁更进一步，以市政府办公室通知的形式，系统性推动全市机关事业单位内部停车位错时共享。通知明确要求，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各单位应尽量将夜间、双休日、节假日的空置车位提供给市民，并详细规定了工作日的驶入、驶离时间。海宁的实践标志着此类举措从单次、临时的惠民行动，开

始向有文件依据、有统一管理规则的常态化便民机制转变。

2019年，这一趋势在旅游城市得到了进一步发挥，开放的内涵也从单纯的停车向综合服务拓展。当年国庆假期，浙江衢州开放了全市68家机关事业单位的约3500个停车位，还同步开放了市行政中心的机关食堂，以优惠价格向游客提供特色套餐，并设立土特产专区和非遗展示区。这些做法不仅解决了“停车难”，更成为城市展现友好、提升旅游体验的“圈粉神器”。

从自发、零散的“节日礼包”，到有序、系统的“制度供给”，机关大院停车资源的常态化开放如今在长三角地区已渐成主流，近年来的开放力度也在不断加大。不过，在各地的实践中，也暴露出一些共性的问题。

一方面，是安全与管理成本上升带来的现实压力。开放大院，意味着外部车辆和人员更频繁地进出，为确保机关单位内部的安全与秩序势必涉及加装监控、增设岗哨或智能道闸等具体措施，而由此产生的人员、设备成本与微薄的公益收费之间往往形成倒挂，导致部分单位对“打开院墙”积极性不高。

另一方面，供需匹配的精准度也有待进一步提高。部分城市市民反映，开放的停车资源存在一定程度错配，有时市民需要的车位在城东，而开放的资源却在城西，或是开放时间与市民的实际需求时段存在“缝隙”。再者，部分市民的契约精神不足，超时停车、不按规定停放等现象时有发生，影响了单位的正常秩序。

让公共资源在更广阔的空洞里为民所用、与民共享，既是城市治理精细化水平的体现，也是政府服务意识转变的缩影。机关大院打开院墙，面向全社会共享停车资源，已被证明是缓解“停车难”最为行之有效且立竿见影的举措，而此中产生的种种问题，终究还是需要政策细化和创新中不断求解。

一场叫停的杀猪宴背后

乡村振兴的故事，从不依赖偶发的流量昙花一现

本报记者 巩持平 见习记者 吴恺云

原本定于1月17日举办的杀猪宴活动，临时通知取消。

乡村领域的文旅博主白永坤是活动主办方和发起人之一。杀猪宴本打算在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煤山镇仰峰村举办。白永坤在自媒体账号上发布了取消通知，当时，报名要来参加的网友已有近千人。

从长兴县到仰峰村，各级行政主管部门都在叫停这场活动，仰峰村杀猪宴活动取消并非个例。

“我家要杀两头猪，有人来帮我按猪吗？请你吃刨猪汤！”重庆女孩呆呆的一条求助视频引爆全网热情，这个略带玩赏式的邀请给她的家乡带来巨大流量。各地文旅纷纷跟风模仿，不少乡村、农场打出“年猪牌”，邀请游客共同按猪、分享杀猪宴。乱象随之出现。一些地方的杀猪宴“供不应求”，预订100桌，实际到场5万人，食品安全、交通疏导、应急保障等措施缺失的问题逐渐暴露。

也正因如此，考虑到乡村原本的接待能力和应对能力，多地杀猪宴活动被限制。从一哄而上到紧急叫停，杀猪宴的热度仅维持了不过10天。

叫停千人杀猪宴

经过反复思量，杀猪宴依旧，杀猪宴取消，网友自发相聚，以“年猪”为名奔赴仰峰村。

1月16日晚上，抵达仰峰村民宿时已过了22时，白永坤还是开了场直播，专门解释活动取消的原因。这场直播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

三个报名群的成员人数加起来将近千人，白永坤预计，“真正到现场的数百人可能翻倍，一个人带两个三个都有可能”。

关于杀猪宴组织混乱的消息不断“蹦”出来。一名游客参与按猪的过程中，被猪踢到了颈椎，受伤严重。一些地方在举办杀猪宴时出现哄抢，菜还没上桌，已经被人拿着塑料袋整盘装走了。白永坤担心，好事没做好，反而成了坏事。王云露是仰峰村文旅领域的村务工作者，她也认为，杀猪宴能吸引游客是好事，但规模不能太大，要保障村里老百姓正常出行。

那两天，长兴县大大小小开了好几个会，要求杀猪宴管控人流量。按照相关规定，超过1000人的活动需要提前20天报备，各方面管控难度非常大。村里意见也很明确，活动最好取消——村里酒店和民宿加起来有20家，但房间数量总共200个左右，接待能力有限。

不过，办杀猪宴的消息已经传播了几天，此时取消，也有不少人意见冒出来。白永坤作为发起人，仰峰村作为主办方，也被吐槽不靠谱。



长三角各地赶来的网友共同准备杀猪宴。

巩持平 摄

白永坤在长兴当地被称为“白局”，虽然他不是任何政府单位的局长。此前，他当过社区网格员，做过村干部，现在是乡村领域的自媒体人，拍视频推荐乡村风景和特产。因为视频主要内容与文旅相关，被网友称为“民间文旅局长”。

杀年猪的是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大叔姓曹。他家大儿子高位截瘫，常年卧床，小儿子因为车祸离世，老两口领养了一个孙女，还在读初中。家里的经济来源主要是山上养的几头猪和十几头牛。往年这会儿，养的猪都已出栏，今年却还剩下四头。曹大叔向村委会求助，能否帮他们想想办法。“我们想趁着这波流量，看看能否帮曹大叔把猪肉卖掉。”王云露说。

思索再三，这场活动被保留下来，不过要缩小规模、缩减时间，活动性质也转变为“陪老人过年”。与此同时，村干部和村民做好了准备，村里十几家民宿的老板也随时待命。

“本意是推广仰峰村，助力老两口。”王云露说，“不能造成资源浪费，给曹大叔添麻烦，还给仰峰村抹黑。”

乡愁、团聚与人情

毋庸置疑，各地都渴望能有机会承接流量。“趁这次机会，这么多人来到我们仰峰村，他们看过风景和环境，说不定下次就来住民宿。”王云露期待着。

杀猪宴上，真正吸引人们的不是一块猪肉，也并非一碗肉汤，而是背后的价值与想象。

直到17日早上，白永坤还很焦虑。“怕人太多，又怕人太少，人太多的话这个地方容纳不了，人太少怕寒了大叔的心。”

开始了，上山抓猪，院里杀猪，支起锅炖肉等过程，都通过他的镜头分享出去。最高峰时，直播间在线观看人数超过1500人。慢慢地，浙E、皖P、苏D等挂着长三角各地牌照的乡村滴滴大叔的小院子和门前的乡村道路。

杨先生是长兴本地人，平时在周边地区烧大灶、烧酒席，当天正好有空，拉来自家燃气灶，支起做饭大锅、摊开桌椅板凳，再次成为宴席大厨；毛先生是苏州人，在长兴工作，拉猪出栏、按猪上凳，他都是主力，两手一摊，手上还留着猪血和猪骚味；一个姓夏的小朋友跟爸爸从绍兴来，分猪肉时看得目不转睛，“第一次看到杀猪，流程比我想象中麻烦很多”。宋先生拎了两箱牛奶过来，“陪老人过年，总不能空着手吧？”

四面八方赶来的人们忙碌起来，热气腾腾。有人蹲在土灶后面烧柴，有人在菜地里摘菜，有人处理刚杀好的猪肉。杀猪宴开饭时，五六个人坐了八桌，每人手上一碗菜饭，桌上有红烧肉、烧土豆、炒猪肝和烧青菜，简简单单的饭食也吃得津津有味。

“我们今天‘奔现’，就算是过个年了。”“以前外婆家每年过年都会杀年猪，两三人一起吃猪肉，很有年味。”陌生人在同一张桌子上七嘴八舌地聊着，人与人之间温情的连接此刻具象化了。可以预见的是，杀年猪和年猪宴很可能成为乡村文旅的固定项目。

不过，若能感受年味，何必执着于“杀年猪”？杀猪宴的热闹背后是人们对乡愁的眷恋和思念，而真正可持续的热闹，来源于对情绪价值的关切、对文旅市场的判断，更根植于对当地特色文化传统的传承与依赖。毕竟，乡村振兴的故事，从不依赖偶发的、难以控制的流量昙花一现。

随便说说

流量焦虑之下 别太指望年猪

于量

最近几天，长三角多地文旅打出“年猪牌”。更有甚者，干脆对“按年猪”事件来了个一比一复刻，找来一名“力不从心”的老人喊话网友来帮忙。

杀年猪、吃杀猪饭的习俗在长三角农村地区并不鲜见，但是如此阵仗未免大了些。

必须看到，流量焦虑如今几乎无差别地笼罩在各地文旅主管部门的头顶。蹭热点之于地方文旅，早已是基础操作和必要之举。“天降流量”的故事反复上演，那些迟迟未被流量眷顾的地方，焦虑感恐怕只会成倍放大。情急之下，“抄答案”就成了缓解焦虑的速效药。

民间自发的偶然事件，为地方带来汹涌的瞬时流量，如此“天降流量”的故事，对于成日里绞尽脑汁、挠破头皮“打造”“赋能”“抢抓”“策划”的地方文旅，无疑极具吸引力。另一方面，各地旅游资源的禀赋先天存在差距，且不论从流量到“留量”的转换，无中生有的“天降流量”，至少让长期游离于主流旅游市场的地方暂时拥有了暂时逆袭的可能。

不过，即便是抄作业，也还是得讲究个方式方法。学习和借鉴从来都值得肯定和鼓励，但是企图对着一些偶然事件进行一比一复刻，不仅有刻舟求剑之嫌，还透着一股急于求成、渴望躺赢的浮躁。

“按年猪”能够引爆流量，在于无意为之。这种无意为之往往最能切中互联网上的某些情绪，具体到此次事件，便是都市人对过往年味的渴望、对热闹的向往。算法的加持下，这些情绪被进一步放大，让事件本身实现指数级传播，引发更大范围的共情，并最终将流量从线上引导至线下的真实场景中。

一比一复刻无意为之，则恰恰是将无意为之变作了有意为之。从第二头猪直至第N头猪，势必遭遇边际效用递减，难以在短时期内被算法反复眷顾。更重要的是，有意为之之无可避免地会显得生硬，甚至有招致反感的风险。

既然效果无法被期待，倒不如暂时与焦虑和解。静下心来，潜心打造、赋能、抢抓、策划，在练好内功的同时等待与无意为之的不期而遇，并在那时切实地抓住机会。地方文旅产业的发展，先天气赋与后天培育素同等重要，在做好自己所能做到的同时合理定位、合理规划、合理制定目标，方才是健康发展的大前提。

总之，别打鸡血，别洒狗血，也别太指望年猪。

本报记者 刘畅

1月16日，第二届“科创·柳叶湖”合成生物制造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在湖南常德举办。60支晋级团队，分为“创意组”与“成长组”展开最终角逐，各团队围绕生物医药、生物材料、AI合成生物制造等九大前沿方向进行路演。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盛会上，“成长组”参赛的30支队伍里，来自长三角的队伍超过60%，分别来自上海、杭州、苏州、南京、南通、诸暨等地。颁奖典礼上，常德经开区、津市高新区、安乡县三基地与一批成长性企业签署项目落地协议，其中有一半来自长三角，包括苏州的华赛生物、聚维元创和上海的硅羿科技等。

长三角和常德到底是如何实现双向奔赴的？

双向奔赴

苏州聚维元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天元一直专注于以秸秆为原料的生物合成技术研发。这一次来参加“科创·柳叶湖”合成生物制造创新创业大赛，张天元不仅带来了团队的项目“秸秆糖”参与比拼，更想与常德建立更深入的合作。

“糖主要以玉米来生产，但常德多是水田，所以用秸秆产糖，恰逢其时。另一方面，国家的生物制造产业目前偏向于非粮生物制造方向，常德如果将非粮糖作为主力发展目标很有优势。”张天元说。常德市安乡县自然禀赋优越，秸秆等有机原料资源丰富，秸秆糖规避了粮食消耗，碳排放也大大低于粮食行业，有利于出口和环保。

这一次，企业与安乡县签约的秸秆综合利用项目总投资达3亿元，年预处理秸秆10万吨，预计年产值可达4亿元。让张天元尤为欣喜的是，通过大赛平台，他能与安乡县县委书记面对面交流，迅速解决了项目落地的关键问题。

在常德津市绿色新材料产业园，参赛队伍之一、上海硅羿科技生产质量总监马樱芳正专注地考察着园区的生物制造“加速工厂”。

作为我国首家RNA生物农药研发企业，硅羿科技的产品即将进入产业化阶段。目前，首款RNA生物农药烟草花叶病毒核酸干扰素已经进入登记审批阶段，预计今年上半年获证。“取证后我们将扩大生产，常德完善的产业链配套让我们看到了可能性。”马樱芳说。津市自酶制剂厂改制以来，已形成了完整的生物制造产业生态。

这些年，为了把合成生物制造这个产业谋划好、推进好，常德在全省率先出台《常德市合成生物制造产业发展规划（2024—2028）》及配套措施，为产业发展提供系统性政策护航。资金上，更是搭建

存续期长达15年、容亏率高达70%的10亿元科创引导基金，设立50亿元的合成生物制造产业发展母基金。

不仅如此，常德还是国内首个为促进合成生物制造产业发展立法的城市，从设立产业基金、开辟绿色通道、保障要素供给等多维度，将政策红利固化为长期制度，用最简短的法律条文解决产业发展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

“对我们科技型企业来说，最担忧的情形之一是基于某一届政府的承诺落地后，后续政策出现不确定性。”本次大赛的参赛企业——来自上海的生合万物公司副总经理汪冬梅坦言：“常德通过立法将支持措施固化下来，相当于给了企业一颗‘定心丸’。”

各扬所长

长三角与常德的合作，体现了各扬所长的区域协同智慧。长三角强于研发与金融，常德则长于制造与转化，这种互补性催生新的产业模式。

在第二届“科创·柳叶湖”合成生物制造创新创业大赛决赛颁奖典礼上，常德市人民政府与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浙江大学杭州国际科创中心、洞庭实验室签署协议。

类似的合作早已不鲜见。这几年，常德市委书记、市长等高层多次带队赴长三角开展招商考察，走访重点企业、科研平台。2024年11月，常德一长三角地区生物制造企业座谈会在沪召开，常德方面直接与30多家头部企业对话。

“飞地研发+常德制造”的模式已然初步走通。一方面，依托“科创·柳叶湖”合成生物制造创新创业大赛等平台，为该模式提供了丰富的项目池。另一方面，常德经开区、津市高新区等核心载体已经在长三角多地设立飞地孵化器，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

不仅如此，锚定合成生物领域顶尖创新力量，安乡与上海交通大学、苏州大学等科研院所达成产学研合作，并与湖南文理学院合作建成合成生物应用研发中心。2025年3月，常德市人民政府与上海合成生物产业创新中心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围绕产业研究、技术攻关、项目产业化等开展全方位合作。

也是3月，常德市科技局赴上海对接合成生物制造产业合作机制，双方达成共识，要系统梳理合作机制，支持常德合成生物制造产业发展纳入沪湘省级合作框架。

一旦实现，这意味着未来两地的合作很可能从单个项目、企业，升级到产业规划协同、政策研究联动、技术联合攻关的深入阶段。

常德与长三角的这场“双向奔赴”，不仅是两个地区的产业联动，更是中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生动实践。